

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海南大学刘复生教授谈海南当代诗歌的三个阶段

建设“诗歌岛”条件已成熟

■本报记者 魏如松

2月16日，省委宣传部举行座谈会，邀请省内文化领域的知名人士等讨论建设海南“诗歌岛”计划。
本报记者 王凯 摄

作为中国诗歌“岭南板块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近年来，海南当代诗歌已经在中国诗坛迅速崛起。在一大批诗人关乎时代、关乎生活的创作觉醒中，如何将海南打造成诗歌岛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歌大省？日前，海南日报记者专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、海南大学刘复生教授，他向记者梳理了海南“新时期”诗歌的三个重要阶段，认为海南建设诗歌岛条件已臻成熟。

海南建省前： 诗歌水平居全国之下

刘复生教授在“海南历史文化大系”中著有《海南当代新诗史稿》一书，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在划分海南新诗发展阶段中，“1988年海南建省既是海南社会历史的转折点，也为诗歌写作提供了历史机遇。建省前，海南诗歌与全国水平有明显差距。”“当时，海南诗人更多习惯于在岭南文化系统内建立地域文化认同，这一点限制了海南诗歌视野的广度，诗歌创作更容易被一种狭小的地域意识所束缚。”

由于当时海南整体经济、文化水平较为落后，缺乏与内地各种意义上的交流，这一时期海南诗歌呈现某种自足状态。

“云逢鹤和冯麟煌两位诗人的作品，当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属较高的创作水平，他们曾和主流诗界与主流诗歌资源建立了联系。”这一时期，海南诗人仍以50岁左右的诗人为主，由于远离文化和诗歌中心区域，

类似于“朦胧诗”一样的诗歌创作未能获得成熟的环境。

海南建省： 为诗歌发展提供机遇

1988年海南建省，十万人才过海峡给海南带来最大变化就是人才的涌入。不少诗人如柏桦、李亚伟、杨黎等来过海南并短暂居住，“曹汉俊、林珂、张锋、凌川、鹿玲等青年诗人还因此留了下来，这一次诗歌潮的影

响现在难以评估。”

“大量来自诗歌中心区域的诗人进入海南，成为新的海南诗歌创作力量，这对海南诗歌史具有深远意义。”刘复生说，“移民诗人将主流诗歌写作的文学资源、观念、技巧带进了海南，改变了此前海南相对滞后的诗歌空气，虽然诗歌史不能以进化论的尺度来衡量高下，但新的思潮、观念的确也有瓦解陈旧模式对诗歌写作的束缚，重新发现生活的能力。”

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，“朦胧诗”、“第三代诗歌”等诗歌观念、技艺全面进入，带动了海南本土诗人的成长，这一时期由移民诗人和本土成长起来的诗人共同构成，他们普遍出生于1960年代，代表了海南诗歌最为沉实的一部分。

2004年： 海南诗歌的标志年份

2004年对于海南诗歌来说，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。

这一年5月，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颁奖会在海口举行，谢冕、吴思敬及两届获华文青年诗人大奖的青年诗人江非、雷平阳等到海南举行学术座谈会；7月，海南10位青年诗人的《海拔诗丛》举行首发式；8月，移居荷兰15年的多多回到中国，到海南大学任教；11月，余光中到海南来参加青年文化论坛并在海南师范大学谈论诗道；12月，海南诗社成立20周年纪念，一本厚达448页的诗集《百花



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编的诗刊《海拔》。(资料图片)

诗集》举行首发式。

刘复生谈到，“尤其是多多定居海南以及稍后王小妮、徐敬亚的到来，对海南诗歌发展具有潜在的象征性意义，实质性地影响了海南诗歌写作。由于他们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影响，主流诗界和民间阅读的双重肯定，从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定居终结了海南在诗歌地图上孤悬海上时代。”

“从一般社会学角度出发，2004年不是网络时代的起点，但这个年头对海南诗歌的影响，比起其它地区来说可能更有意义。”刘复生说，对于1960年代末以后出生的人，尤其是80后诗人和写作者来说，网络诗歌或诗歌网络化的新环境，对诗歌写作的影响是深刻的，“随着网络化时代的到来，海南诗歌才真正来到了一个全国性的时代，因为地理距离进一步降低了其限制性意义，它被网络的距离极大抹平。这种网络结点式结构，使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，普通人在诗歌方面的阅读、发表上也能与全国保持同步。”刘复生最后说。

(本报海口2月21日讯)

海南建设诗歌岛，犹如春天的海风都韵，直指人们的心脾。在国内目前多元共生的诗歌领域，海南诗歌已经有了不可替代的文化身份，最大价值地呈现出了诗歌自由、开放、包容的时代精神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较长时期，海南诗歌被指为无个性。海南成为一个大家共识之下的诗歌外省。近年来，随着“移民诗歌”的影响再次进入，海南诗歌携带着浓郁的海洋风格特色，实现了地域意义上的重生，涌现出了纪少飞、林琳、卢炜、曾德英、符力等具有本土性格的诗人。

海南诗歌领域逐渐成形的“诗歌海军”，其影响和特性成为国内诗歌界的异类。以我省著名诗人李少君为代表的“草根诗学”，在国内诗歌评论界也是别树一帜。诚如著名诗歌评论家、武汉大学教授荣光启评价，海南诗歌最大特色就是岛屿性与大海性，与国内其他省份的诗歌作品相比，海南诗歌大多表现出了清净、开阔的自然气质。

海南诗歌 迎来春天

■卓兰花

由此，海南具备了打造诗歌岛的几大因素。首先，海南的诗人数量与人口比例是全国最高的，既生活着一批一流的诗人，也落户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；其次，海南处中南地理边缘，恰恰为海南诗歌提供了独特的边缘观察角度，以一个开放的、自由的、清朗的姿态，关注海岛特有的人与自然的话题，产出了一批有别于大陆文化影响下的海南诗歌与诗人。著名诗人、海南大学教授王小妮说，在海南写诗，有一种想吐出来的感觉，是一种个人的幸福。海南会让每一个诗人把诗歌视为是灵魂上升时，对世界那一瞬间的简单尊敬。

海南打造诗歌岛的条件已臻成熟。海南省作协与时俱进将诗人团结在一起，移居海南的诗人、评论家则带来了自朦胧诗直到“70后”诗歌的多重精神内涵，海南诗人实现了内地与海岛生活的时空交错、碰撞，储备了多彩而丰富的心灵矿藏。中国30年间的诗歌经验同时汇聚海南，为海南架构起一个多元化、多层次、多方位的完整的诗学框架。

基于此，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，海南迎来了诗歌的春天。

诗歌社团：

●海南诗社

成立于1984年中秋节，诗社宗旨是“交流诗歌创作情况，增强海南诗界联系和友谊，促进海南诗歌创作繁荣，努力开拓琼岛一代新诗风。”诗社由诗人林施均、邝海星、云逢鹤等发起成立，首任社长为原海南大学党委书书记、诗人林施均。该诗社是海南当代成立较早，坚持时间最长的诗歌社团，是海南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的一面旗帜。

●红帆诗社

“红帆”大学生诗社于1986年12月1日由林远（远岸）发起并成立于当时的海南

海南当代诗歌大事记

著名诗歌评论家耿占春任所长，集中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重要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如多多、王小妮等，该所是中国最南端的一个新诗研究与创作中心。

●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

成立于2004年12月，隶属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，学院特聘《天涯》杂志主编、诗人李少君为研究中心主任、客座教授。曾主办首届当代汉语诗歌研讨会，并编辑出版

●诗歌机构：

●中国新诗研究所

成立于2004年8月，隶属海南大学，由

《当代汉语诗歌丛刊》

诗歌刊物：

●《诗文学报》

海南诗社机关报，是海南为数不多的专业诗歌刊物，办刊经费为社会筹集，目前发行区域主要为岭南及东南亚。

●《天涯》

海南省作协机关刊物，在20世纪90年

代中期以前也刊载了大量诗歌创作，但真正成为全国性的重要诗歌阵地则是在1996年《天涯》改版后。改版后的《天涯》是一份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性人文思想杂志，但就诗歌影响而言，它同样重要。

●《海拔》

海南省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主编的专门刊发海南诗人新作的诗刊。《海拔》以推出、扶持海南诗歌新人，集中展示海南诗歌创作实绩为追求，成为凝练海南新生代创作力量的中心性刊物。

(小魏辑自刘复生著《海南当代新诗史稿》)

●书情快报

●书人书事

《中国30年》



这是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史，在20余年的时间里，他考察了全国20多个省份，独家访问百余位省部级官员、学者和企业家。除以不同于国人的视野记录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外，尤其关注领导层面的思维方式，力图向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的当代中国。其中许多资料系独家披露。

《中国30年：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》[美]罗伯特·劳伦斯·库恩/著，吕鹏等/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

一线作家 新作在各大文学期刊纷纷亮相

2009年新春伊始，铁凝、王蒙、张贤亮、张洁、余秋雨、刘震云、阿来与黄永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在各大文学期刊的第一、二期纷纷亮相。

《收获》第一期同时刊载了黄永玉的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、张贤亮的长篇小说《一亿六》和王蒙的短篇小说《岑寂的花园》以及余秋雨追忆导演谢晋的散文《门孔》。《钟山》刊发了中国文坛唯一获两届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张洁的新长篇小说《灵魂是用流浪的》，《人民文学》第二期刊发了刘震云的长篇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

记者还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得知，作家张贤亮的《一亿六》预计于3月上市，届时张贤亮将赴上海参加新书的首发式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方面，阿来的《空山3》近日出版，一套王安忆的短篇小说编年即将集结出版，同时，2套包括刘震云等知名作家的文集也在紧锣密鼓地出版中。

(据新民晚报2009-02-16，夏琦/文)

怀天蔚

■来新夏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是一位勤奋好学，默默耕耘的纯学者。他学兼史志，与我的研究方向正相吻合，所以我们在学术上时相切磋砥砺。他对自己的学业不断进取，著有宋史和地方文献方面的多种论著，而成书之后，他仍继续钻研、增订、修正，不断完善，如1995年，他汇总三十年来研究成果，成《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》一书，志界同仁多予好评，而天蔚兄犹以为尚未完善，又以七年之功订正补益，于2001年成《地方文献论集》巨著，由大陆海南出版。内容之富，论点之精，已为学者所共识。而天蔚兄一本精益求精之旨，不仅续有订正，复增入新作数篇，重加编订，交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，并邀我作序。他为向读者负责，亲加校订多次，直至卧病。其尊重学术，敬事而信的严谨学风，令人钦敬。他对我严，对友则真诚坦荡，不对他人作曲意迎合，对学者著述都实事求是地提供善意建议。拙编《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》一书，出版后曾分赠多处，惟天蔚兄以数月之功，通读全书，细加分析，论其得失，自抒胸臆，写成篇幅，收入《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·方志篇》中，单立专章，达二十余页(十六开本)，两万余字，其勤其情，令我思之，不禁泫然！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是一位勤奋好学，默默耕耘的纯学者。他学兼史志，与我的研究方向正相吻合，所以我们在学术上时相切磋砥砺。他对自己的学业不断进取，著有宋史和地方文献方面的多种论著，而成书之后，他仍继续钻研、增订、修正，不断完善，如1995年，他汇总三十年来研究成果，成《方志学与地方史研究》一书，志界同仁多予好评，而天蔚兄犹以为尚未完善，又以七年之功订正补益，于2001年成《地方文献论集》巨著，由大陆海南出版。内容之富，论点之精，已为学者所共识。而天蔚兄一本精益求精之旨，不仅续有订正，复增入新作数篇，重加编订，交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，并邀我作序。他为向读者负责，亲加校订多次，直至卧病。其尊重学术，敬事而信的严谨学风，令人钦敬。他对我严，对友则真诚坦荡，不对他人作曲意迎合，对学者著述都实事求是地提供善意建议。拙编《中日地方史志比较研究》一书，出版后曾分赠多处，惟天蔚兄以数月之功，通读全书，细加分析，论其得失，自抒胸臆，写成篇幅，收入《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·方志篇》中，单立专章，达二十余页(十六开本)，两万余字，其勤其情，令我思之，不禁泫然！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天蔚兄为人诚恳热情。我们虽为初识，但声应气求，时有书信往来，并互赠单篇文章和著作。当时大陆正在首届修志热潮中，天蔚兄非常关心这一事业，多次参与有关地方志的会议，在当时志坛已声名鹊起，我们之间的交往，也日益频繁。我们对促进两岸方志界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共同愿望。经过我和他在大陆与台湾，各自努力推动下，终于在1997年底在天津召开“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”。1998年11月，又在台湾台中兴大大学召开“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”。这对团结两岸学者和推动方志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天蔚兄为此奔走联系，促成举办，竭尽心力，为学界同仁推为首功。

</